

北河公园里的地域文化展示

□ 谷景峰

北河,古称漉河,又名通津河,发源于滦县大霍庄子村(今属滦州市古马镇),城内全长27公里。元代大将那颜倭盍统兵攻打南宋时,利用北河漕运,囤积粮草于此。上游为季节性河流,进入倭城(今属滦南县)后,河面变宽加深,最宽处200余米,最深处近10米。常年蓄水区域长8.5公里,平均水深2米,蓄水总量近200万立方米,是北方难得的天然水体资源。

北河之水历经千年而不枯,是我国北方地区县城少有的自然水体。昔日的北河已随历史的尘埃而去,但北河的风采依旧。2010年,滦南县委、县政府“还河于民”,兴建北河公园。

2011年,北河水城成功入选“唐山八景”。

2012年5月1日,北河公园正式开园,结束了滦南没有大型综合公园的历史,滦南旅游观光正式启动。

北河公园设计融入历史文化、地方名人等元素,“以史为鉴、以水为魂”,依水而建、借水设景,规划建设了六大景区。园内碧波荡漾、绿树成荫,树木花草高低错落,亭台雕塑点缀其间,野鸭水鸟畅游河面,彩鱼锦鲤争相嬉水,形成了“水在景中、景随水走”的景观效果。

园内的三亭苑以“冀东文艺三枝花”为主题,分别为赏心亭、悦目亭、欣闻亭,对应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皮影、评剧、乐亭大鼓三种艺术形式。景区内有两个广场,成兆才纪念馆广场立有评剧创始人成兆才先生的胸像;“三枝花”广场矗立“冀东文艺三枝花”主题雕塑,依滦南县县花——荷花和“冀东文艺三枝花”创意设计。雕塑圆形底座高71.6厘米,代表滦南71.6公里的海岸线。主体雕塑采用钢结构制成,高16.8米,由红、白、蓝三色花瓣围成荷花形状,下衬荷叶图案——红、白、蓝三色分别是荷花、白玉兰、马兰花的颜色,三种花分别代表评剧、乐亭大鼓、皮影三种艺术形式。

渤海女儿雕塑亦称美人鱼雕塑,高5.5米,选用花岗岩石材雕刻而成。雕塑内容为美人鱼身少女,象征着勤劳善良的滦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三娥苑为纪念民国奇女子、替姐申冤告状的杨三姐而建,主题是弘扬公平正义、促进社会和谐。苑中央设置杨三姐塑像,让人们不忘杨三姐追求正义、勇于抗争的精神;左侧为“三道门”雕塑,右侧是3个巨型大碗雕塑,最西侧乃“海之韵”雕塑。

“三道门”雕塑由高12米至16米不等的三道抽象大门组成,采用钢结构着白色氟碳漆,象征杨三姐不畏权势,勇闯三关为姐申冤。

“三个大碗”雕塑分别高2.3米,碗口直径7.16米,采用不锈钢材质,表面着白色氟碳漆,寓意“三碗水”端平——公开、公平、公正,也代表科学执政、民主执政、依法执政。

“海之韵”雕塑高16.8米,不锈钢材质,主体为蓝色浪花之上17只海鸥展翅腾飞,寓意由17个镇(街道)组成的新滦南弄潮渤海,全民共建和谐家园。

惠民广场位于北河北岸,与三亭苑隔河相望,是展示滦南历史文化与发展成果的综合市政广场。广场中心两侧设置16座花岗岩图腾柱,分别为:夷齐让国、曹妃传奇、马城置县、倭城始建、戏圣兆才、三姐申冤、大师文然、影王绳武、京东名镇、三米之乡、北方大港、薛村火种、抗日暴动、慧英夺冠、华西北上、水城新颜,展示滦南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;广场东部地雕内容为三大名镇(倭城、柏各庄、马城),冀东文艺三枝花(评剧、皮影、乐亭大鼓),三米之乡(大米、海米、花生米),四大增长极(城西工业区、马城循环经济区、嘴东经济开发区、北河新区),主要展示滦南独特的发展优势。

惠民广场位于北河北岸,北河大桥东侧,广场上设有中国古代十大名儒的青铜塑像,塑像面向惠民广场方向,寓意崇尚人民,广场因此得名。广场南端连接夷齐岛。十大名儒分别为孔丘、孟轲、荀况、董仲舒、郑玄、韩愈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。惠民广场位于北河北岸东端,主要承担体育公园的功能。广场中央矗立“女排夺冠”雕塑,主旨纪念中国女排队长、滦南籍人士曹慧英与队友首夺世界冠军。“女排夺冠”雕塑主体为不锈钢材质,采用原色镂空工艺,高6米,由3个不同姿势的球员组合而成,表现团结拼搏、无私奉献、自强不息的女排精神。

悦民广场主要包括北河公园美术馆、滦南县规划展馆。北河公园美术馆为两层钢结构建筑,其外形如一面大鼓,与“天下第一影人”雕塑和“花为媒”雕塑共同代表滦南“冀东文艺三枝花”。

滦南县规划展馆如同一艘启航的大船,气势宏伟,寓意滦南发展乘风破浪向远方。

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

——简述从《救国报》到《唐山劳动日报》的烽火岁月(2)

□ 王烁辉

1.《救国报》的创刊

(接上期)

冀东大暴动后,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冀东抗联队伍西撤。而日本侵略者在全国抗战形势转入相持阶段后,回师华北,对抗日根据地以军事“扫荡”为主要内容的“治安肃正”。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从武汉前线返回,其主力第一联队和第二联队一部进驻冀东东部地区,并立即对冀东游击区进行连续的围攻“扫荡”。

当时冀东仅有一些基础较好的村庄有我党的组织在工作,其他广大地区尚未开辟,敌人十分猖狂,沟壕堡垒星罗棋布,汉奸特务横行霸道,再加日伪频繁的“扫荡”,对敌斗争环境格外残酷。在这种情况下,救国报社不可能公开,必须隐蔽活动。

卢各寨的尹福卿以较进步的方式经营果园和其他副业,当时,因环境残酷,他本人和其他三子都不在原籍,只有长子尹铭枢在家主事。尹铭枢在当地也有一些名望,日寇认为这样的人是比较可靠的。但实际上,尹铭枢一直秘密为我党工作。为此,报社办公地址就选在他家。

崔林在冀东抗日大暴动时期,就在抗日联军第五支队负责政治工作,他不仅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,又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。《救国报》创办初期,崔林不仅要负责出刊、协调等各项工作,而且所有稿件的统筹处理、编辑修改,还有社论、短评、时事述评的撰写,也都由他一人完成。当时崔林不到30岁,是风华正茂的年纪,他对党忠诚,工作有魄力,平易近人又善于团结同志。他识人用人能力极强,吸收发展的《救国报》早期办报成员不论是人品还是业务能力都值得称道;其中,尹铭枢是本村人,也是尹铭枢的同族,他工作积极,对人热情,也是以小学音乐、美术教员身份出现的一位英俊青年;冯国玺本是尹家果园的正式养蜂工人,他体格健壮,和蔼可亲,兼有农民和工人淳朴厚道的气质;严德成家住卢各寨后街,为人直爽又机敏,还非常善于交流,工作上更是泼辣能干;刘海山是崔林的警卫员兼交通员,他的工作多为秘密联系与行动,不经常在卢各寨活动。

日伪当时以密集的据点和碉堡将长城沿线地区形成一条封锁线,又发展特务组织,以保甲连座,建立户口、门牌、

“良民证”等制度,对每一个小游击区单独构成封锁圈。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,从根据地来协助《救国报》工作的丰原,辗转许久才到了鲁家峪。

1940年初冬一个阴霾寒冷的日子,崔林和山海将丰原接到了卢各寨南山,对外说她是尹铭枢的妻妹,从唐山来住亲戚,探望姐姐。丰原的到来缓解了救国报新闻采编人员不足的情况。

从此崔林一边手把手指导丰原如何在敌后开展隐蔽工作,一边指导丰原编写文章。在这种环境下,丰原快速成熟起来。他们将新闻编写排版后,再交由尹铭枢秘密地在家中刻写。

严德成家后院有两个分别存放白薯和萝卜的地窖。他们将此二洞深部挖通,作为印报发行工作室。因洞口窄窄,不能放入桌子,就在洞的中间和周围留了许多土台作为桌子和存放材料之用。每当夜深人静,尹铭枢刻完蜡纸,除冯国玺外,大家聚在严德成家中,一面紧张地进行裁纸、印刷、数片、写封套等工作,一面布置下期的任务,一起筹划着纸张、油墨等物资供应。就这样,一次次从入夜工作到破晓。报纸印出后,为了不暴露目标,都是由严德成背到离卢各寨数十里以外的村庄,通过交通站以沿村转送的方式和意想不到的速度,送到各部队、机关和读者手里。当时报纸只能按照组织系统分发,每个基层组织只能得到一份。这份报纸就是干部、群众、战士们最宝贵的新闻读物,最重要的时事学习教材。

在报纸最初出版的一段时间里,敌人对卢各寨一带还不大注意。有时来“清乡”,也只是搜索一阵就走了,所以报社的同志们能够以公开的职业和身份为掩护,秘密地编辑出版报纸。

这一时期,冀东地区游击区、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也在顺利发展,不断扩大。逐渐,在丰玉遵、迁遵兴、丰玉宁等县的很多村庄,我们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已公开和半公开地活动了。但同时,也引起了敌人的关注,因而对山区、对卢各寨一带的骚扰便也越来越频繁。

《救国报》的出版活动,虽说是极端隐蔽保密,但在本村、邻村和一些有关系的地方,总免不了有些暴露,这就引起了敌人对这一带的进一步注意。1941年初夏的一天,日伪军突然对卢各寨村和小学校进行了一次严密搜查,搜出一些较

可疑的物资并带走了尹铭枢。幸而因他是当地较有头面的士绅,破绽又不大,经过多方面疏通,敌人终于把他放回来了。

此时,报社在卢各寨的地址已暴露,同志们也就不可能再在敌人面前伪装周旋了,索性公开身份,四处辗转游击办报。这期间,他们经过几度转移,在敌寇的频频“扫荡”下,仍出版了两期报纸。

《救国报》初建一年多的时间里,由于环境残酷,与上级党组织联系较少,国内外及地方新闻来源困难,物资供应极端匮乏,又是伪装秘密工作,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困难的。在这一时期,《救国报》共出版了几十期。这张八开两页不定期的油印小报纸,却使党的声音传遍了冀东广大的平原和山区,传遍长城内外、滦河东西、甚至敌伪据点。每个村庄的人一见到《救国报》都争相传阅,它坚定了群众抗日救国的信心,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争意志。在建立党的组织、开辟地区工作和团结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等方面,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同时,在办报方面,也摸索出了一些宝贵经验。

(待续)



卢各寨村内山洞,《救国报》曾于这一带游击办报。

旧居那九间老屋

□ 刘士裕

根根部,每年春天都要生出新芽。同葡萄的枯藤败叶形成鲜明对照,院子西边的一丛翠竹却长得郁郁葱葱。秦亚和说,父亲喜爱竹子,爱画竹也爱栽竹,且走一处栽一片。1946年搬进新居,他从植物园移来幼竹栽在这里,很快形成一片绿荫。外出归来或下班回家,总要绕着竹丛踱步,漫吟白居易的《画竹歌》,对竹篔簹静默观察。尤其雨后,或读书,或作画,或休憩,经常是“帘开一笑新栽竹,雨露沾濡长翠森”。笔兴所致,他将胸中之竹,物化为手底之竹,或风竹、或雨竹、或雪竹、或月竹,不惜废纸三千,画稿盈案。

秦仲文一生画了数不清的竹画,且大都有趣诗。说到兴处,秦亚和从里屋拿出一本父亲送给长孙秦继曾的册页。题材有山水、梅、竹,共12幅。其中一幅墨竹上题旧句曰:“侵寻老病自相加,枕上如同雨后来。睡醒中宵忙起望,月光雪竹上窗纱。”道出了作者晚年的身体状况。其实在中国美术史上,善画竹者不乏其人。元代李衍曾著有《竹谱》,可惜传到近代已有序无谱。秦亚和老伴石柱兰拿出《当代名家技法汇编》给我看,其中收录有秦仲文的《竹谱》。这是秦仲文集平生之经验,直到逝世前一年才完成的。他在文中写道:“如能以此可补李衍《竹谱》之遗失,而成完谱,则又区区之愿也。”

秦亚和接着又从书箱里取出一本1934年出版的《中国绘画学

史》。这是一本由秦仲文著、立达书局发行的原版图书。我翻开内页,看到天头、地脚、外边,甚至页心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。正在我迟疑时,秦亚和解释:“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曾与人民美术出版社定过两次契约写中国绘画历史。从1956年开始,父亲先是在《中国绘画学史》原版书上做了修改、补充、增删,就形成了您现在看到的样子,这可以说是《中国绘画史略》的底稿。前后历时两年,待内容确定下来后,父亲请远房弟弟誉写成四卷本近20万字的初稿。”

“那后来怎么样了?”我问。秦亚和说:“1958年10月,父亲将初稿交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审定,并进行了修改整理。遗憾的是,后来不知何故,书稿退还,不再出版。”提起往事,秦亚和心中充满了惆怅和无奈。在笔者第三次拜访时,秦亚和同次子秦续曾,与秦仲文学生、著名美术评论家郎绍君及笔者曾一起商讨过启动《中国绘画史略》的出版事宜。家人亦愿出手一幅老画作为出版费用。后因种种原因,终未能实现,成为秦家的一大憾事。

其实,秦仲文旧居还有一件极具文化价值的文物——太湖石。秦亚和说,当年就立在这丛翠竹前,有人的肩头那么高,竹石相映,浑然成趣。父亲曾据此画过一幅《群峰拱翠图》,并亲笔题写了“群峰拱翠之居”横幅,悬于画室外门楣之上。后怕遭人破坏,就理在了院子里,他还

把我领到掩埋的位置。秦亚和向笔者谈了自己的想法:待条件成熟时,将故居修葺如当年情状,并把家藏和社会流散的父亲文稿、书画,以及有关资料搜集整理出来、展示出去,供学者研究,并对游人开放。届时再把太湖石“发掘”出来,放回原处。

秦仲文旧居位于北京阜(成)门(山)文化一条街北侧,胡同口西侧便是全国唯一现存的历代帝王

庙。附近还有白塔寺、广济寺、鲁迅博物馆、程砚秋故居等,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。由于种种原因,当时秦仲文旧居已年久失修,结构也遭到了损坏。

听旧居的主人叙说当年的故事,就像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。如今秦家胡同7号那九间老屋,早已物非人亦非,但它承载着一位老文化人10年的喜怒哀乐、艺术履迹和人文情愫。



秦仲文工作留影

